

大公报人

张高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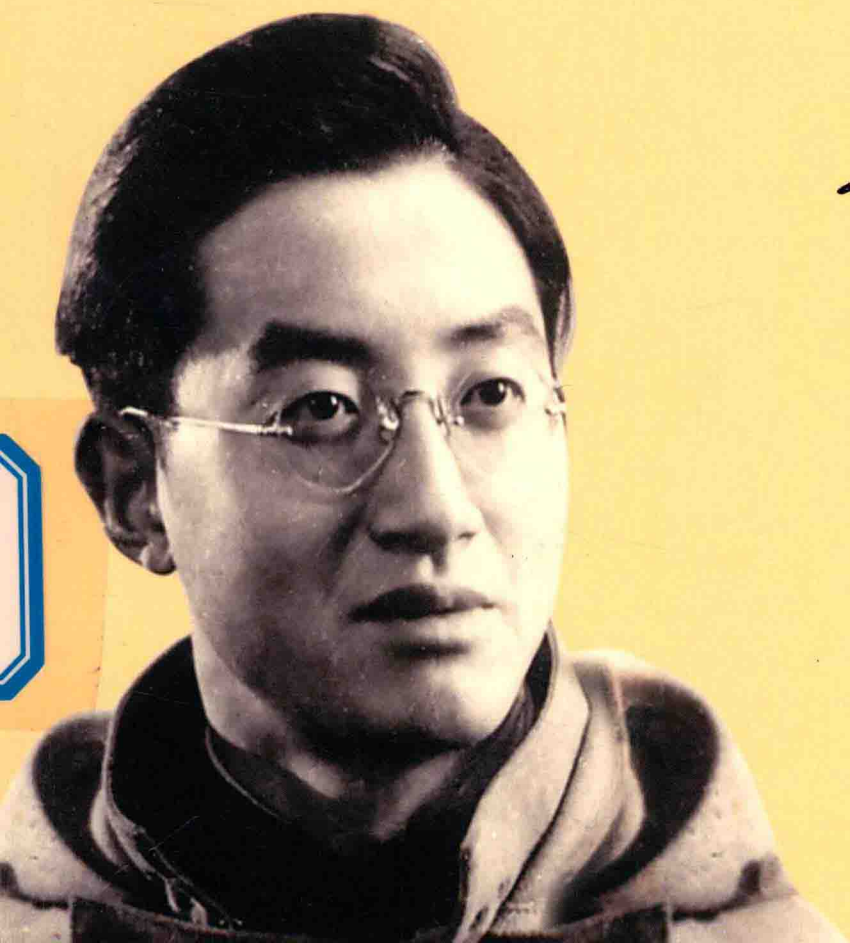
第一部

高峰自述：抗战生涯

滇邊激戰我軍殲敵
大猛龍方面斃傷敵千餘名

张高峰◎遗稿

张刃◎整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大公报人

张高峰

第一部

高峰自述：抗战生涯



张高峰◎遗稿

张刃◎整理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文艺出版社·太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峰自述, 抗战生涯 / 张高峰著.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5.6

(大公报人张高峰 / 张高峰, 张刃主编)

ISBN 978-7-5378-4433-8

I. ①高… II. ①张… III. ①张高峰 (1918 ~ 1989) — 自传 IV. ①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7434 号

书名: 高峰自述: 抗战生涯

遗稿: 张高峰

整理: 张刃

责任编辑: 孙茜

书籍设计: 张永文

插图设计: 阎宏睿

印装监制: 巩璠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峰 邮编: 030012

电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真: 0351-5628680

网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数: 200 千字 印张: 14

版次: 2015 年 6 月 第 1 版 印次: 2018 年 1 月山西 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8-4433-8

总定价: 78.00 (全二册)

致读者

先父张高峰（1918~1989），抗日战争初期踏上新闻工作之路，先加入范长江领导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今中国记者协会前身），后入职大公报，从通讯员、记者到特派员，从抗战到内战，辗转于川西、中原、重庆、平津及东北各地采访、报道，他的作品以“战地通讯”著称。1949年以后，历经大公报改组、转型，至1961年被迫离开记者岗位，“下放”东北边陲，在大公报供职逾二十年。1963年改做文史工作，“文革”中被审查、批斗，再次“下放”，做了五年“农民”。1978年重新工作，继续从事文史研究，并连任天津市政协委员。工作之余，撰写了大量宣传爱国统一和改革开放的报道，成为他晚年创作高峰。

整理父亲的回忆录，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父亲生前曾以《萍踪漫忆》为总题，准备记述他记者生涯所经历的重要事件、人物，并列若干题目，草成若干篇目，惜以精力不济、多病早逝而未完成，留下遗憾。

二、父亲去世后，我保存了他所有的文稿、书信、笔记、剪报（包括他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写的自传、检讨），加之他与我的多次谈话以及图书馆存大公报，特别是我自己也做了二十多年记者，深知个中滋味，使得我有条件尽可能完成他的遗愿。

以上只是私人因素，若由此出发，可以结集纪念，却并无公开发表的意义。重要的是以下两点：

三、作为爱国知识分子、民主人士，父亲的一生经历了现代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战争和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曲折坎坷，跌宕起伏，甚至具有某种戏剧性。把它如实记录下来，或可作为那一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样本，留给后人研究。

四、作为新闻记者，而且与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大公报相关联，父亲的所

见所闻、所思所写，尽管只是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一地域、某一层面，但那毕竟是历史的一部分，是观察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独特视角。在某种意义上，完整的、宏观的历史，就是无数微观“碎片”的组合。况且，记者留下的文字都是即时的、原始的记录，白纸黑字，无可更改。较之学者的研究，更接近事实，因而更具有真实性和史料价值。

因此，在沉淀了多年，广泛阅读、反复思考之后，我决定整理父亲的回忆录。

这部《抗战生涯》是父亲个人历史的第一部分，记述了他在抗日战争期间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这个时期，正是他的青年时代（十九岁至二十七岁），抗日、求学、入职，颠沛流离，曲折复杂，以致成为他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重点、反复审查的历史，也因此留下了比较翔实的文字。

我知道，由亲属撰写或整理前人的回忆录，难免会有溢美、讳言，甚至失实、谬误。为了尽可能避免此类文字，我遵循自己多年做记者坚持的“客观、真实”原则，决定以父亲自述的方式，让他自己“说话”——即以他生前所撰文字（成稿及未完稿）为基本主干，间以其报道、笔记、书信摘录，以及和我的谈话，按照时序串联、整理而成。为保存历史原貌，保持文字个性，文中尽可能使用了原始资料。我的少量注解，也均取自有所依据的相关文字，以补自述之不足，以佐证我的整理工作“不溢美、不讳言”的初衷。

张刃 2013年春
父亲去世二十四周年于京华

引子·家世

1918年农历十一月廿日，我出生在河北省宁河县（今属天津）芦台镇的一个没落书香家庭。

芦台是宁河四大名镇之一，蓟运河、（北）平沈（阳）铁路都从这里通过，交通便利，文风亦盛。我的祖上靠读书、科举，从务农到做官、经商、租佃，维系了三代富足，到我出生时，家道已经衰落，土地卖光了，浮财没有了，只剩下一所住宅。秀才出身、在县立中学教国文的祖父，不得不经常变卖家具、衣物，以及为他人做书画，以维持家庭开销。^{【注1】}

我的父亲张继曾（1897~1925），是家族中第一个接受现代高等教育的人，也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北京大学化学系毕业后，回到母校天津南开中学任教。他本可以成为改变家庭命运的人，但可惜的是，年仅二十八岁时就患肺结核故去了，当时我只有七岁。我的母亲于漱石（1894~1972），在留日归来的外祖父鼓励下，是她们那一代最早“解放”缠足的少数人之一，接受过新式小学教育，粗通诗书。父亲去世后，母亲带着我和五岁的妹妹、四岁和两岁的两个弟弟成了孤儿寡母。到我十岁时，祖父把最后的房子也卖掉了，并宣布再也无力供养他的子孙。我们母子五人只得找房子另住，从此依靠亲友帮助和母亲做点针线活、教几个儿童识字，挣点钱维持生活。

家道的败落，很令我的祖父不甘，他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改变家族的命运；生活的艰辛，更让我的母亲感到痛苦，也把希望寄托在我这个长子身上，经常教育我“好好读书，将来为孤儿寡母争口气”，以洗寄人篱下、

遭人白眼的辛酸。

家庭的境遇、长辈的教育和生活的磨难，对我日后思想的形成、职业的选择和人生的道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注1：查清光绪六年《宁河县志》卷七，选举志中“乡举”栏下有“张廷良，同治壬戌（1862年）大挑一等，江苏试用知县”的记载，他便是张氏家族中第一个做官的人和“创业者”，是我父亲的高祖父。

“大挑一等”是清朝一种特殊的选官制度。为了给读书人更多做官和效力朝廷的机会，从乾隆年间形成定制，在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中，挑选人才给予任用，名曰“大挑”。“大挑”每六年举行一次，一等任用为知县，二等任以教职。奇怪的是，“大挑”不考文章辞赋，只看被“挑”者的相貌与应对能力。这大约也是当时官场的一种需要。

张廷良做了官，慢慢地置了家业，加之他的兄弟、后辈在家乡经营，逐渐发达起来。鼎盛时期，有土地若干，店铺若干，一时成为芦台镇上大户。可惜，后代子弟不争气，不仅不事农商，而且奢靡、挥霍，不过三代便把祖业糟蹋光了。到我曾祖父一代，已呈没落之势，其子侄中虽有发奋者，也无力回天了。——张刃】

	1/ 致读者
	1/ 引子·家世
第一章	
平津沦陷	3/ 北平的学生公寓
	5/ 抗日救国与新闻理想
	7/ 卢沟桥的枪声
	9/ 迟来的报道
	12/ 不做亡国奴
	15/ 沦陷后的天津
	17/ 屈辱流亡路
第二章	
带笔从戎	23/ 战时南京一瞥
	24/ 搞宣传的学生“兵”
	26/ 随军增援台儿庄
	28/ 军旅生活苦中乐
	30/ 奇特的战斗序列
	32/ 血战后的巡礼
	34/ 南阳整训
	36/ 武汉外围保卫战
第三章	
颠沛流离	41/ 刘良模与邹韬奋
	43/ 军人服务部与史沫特莱
	45/ 冲出长沙大火

	47/ 在浙西北前线
第四章	51/ 再晤范长江
初识国共	53/ 国共合办游干班
	55/ 叶剑英与南岳僧侣
	57/ 北渡黄河走太行
	59/ 孙殿英浑人浑话
	62/ 我所知道的汤恩伯
	64/ 抗战中的苏军
	66/ 中国的“马奇诺防线”
	70/ 与徐逸樵先生话旧
第五章	75/ 奔向大后方
步入报坛	76/ “青记”与国新社
	79/ 重庆被轰炸的日子
	81/ 我与范长江
	83/ 与大公报结缘
	85/ 范旭东与川西“新塘沽”
	88/ 中国纯碱与“洋碱”的苦斗
	90/ 战时的内迁工厂
	92/ 犍乐地区工业扫描
第六章	99/ 乐山的大学生活
武大岁月	102/ 教授群与我的恩师
	104/ 我的同窗好友
	108/ 读书之余
	111/ 我与“新闻部队”
	114/ 我上了“黑名单”
第七章	121/ 再赴中原战场
灾难中原	122/ 《豫灾实录》始末
	127/ 停刊与逮捕的背后

目 录

	132/ 续写饥饿的河南
	136/ 黄泛区纪行
	140/ 畸形的界首
	143/ 人祸“汤灾”种种
	146/ 唐人、《金陵春梦》及其他
	150/ 流亡学生与“四行勇士”
	152/ 来自沦陷区的消息
	157/ 亲历中原会战
	160/ 目击国军溃败
	163/ 中原之战尾声
	166/ 两遭逮捕回重庆
第八章	171/ 再入武大前后
川西来去	172/ 抗战后期的武大
	175/ 追忆朱光潜先生
	178/ 血肉筑成乐西路
	181/ 当年西昌见闻
	184/ 鸦片、枪支、大烟灯
	186/ 邓秀廷与刘文辉
	189/ 与刘文辉一席谈
	191/ 西康“鸦片之战”
	194/ 战时工业的苦撑
	196/ 冯玉祥的画与话
附录	199/ 无愧于国家和民族
	——解读几位抗战老兵的通信

第一部

平津沦陷

品名	品名	品名	品名
1. 猪鬃	2. 猪鬃	3. 猪鬃	4. 猪鬃
5. 猪鬃	6. 猪鬃	7. 猪鬃	8. 猪鬃
9. 猪鬃	10. 猪鬃	11. 猪鬃	12. 猪鬃
13. 猪鬃	14. 猪鬃	15. 猪鬃	16. 猪鬃
17. 猪鬃	18. 猪鬃	19. 猪鬃	20. 猪鬃
21. 猪鬃	22. 猪鬃	23. 猪鬃	24. 猪鬃
25. 猪鬃	26. 猪鬃	27. 猪鬃	28. 猪鬃
29. 猪鬃	30. 猪鬃	31. 猪鬃	32. 猪鬃
33. 猪鬃	34. 猪鬃	35. 猪鬃	36. 猪鬃
37. 猪鬃	38. 猪鬃	39. 猪鬃	40. 猪鬃
41. 猪鬃	42. 猪鬃	43. 猪鬃	44. 猪鬃
45. 猪鬃	46. 猪鬃	47. 猪鬃	48. 猪鬃
49. 猪鬃	50. 猪鬃	51. 猪鬃	52. 猪鬃
53. 猪鬃	54. 猪鬃	55. 猪鬃	56. 猪鬃
57. 猪鬃	58. 猪鬃	59. 猪鬃	60. 猪鬃
61. 猪鬃	62. 猪鬃	63. 猪鬃	64. 猪鬃
65. 猪鬃	66. 猪鬃	67. 猪鬃	68. 猪鬃
69. 猪鬃	70. 猪鬃	71. 猪鬃	72. 猪鬃
73. 猪鬃	74. 猪鬃	75. 猪鬃	76. 猪鬃
77. 猪鬃	78. 猪鬃	79. 猪鬃	80. 猪鬃
81. 猪鬃	82. 猪鬃	83. 猪鬃	84. 猪鬃
85. 猪鬃	86. 猪鬃	87. 猪鬃	88. 猪鬃
89. 猪鬃	90. 猪鬃	91. 猪鬃	92. 猪鬃
93. 猪鬃	94. 猪鬃	95. 猪鬃	96. 猪鬃
97. 猪鬃	98. 猪鬃	99. 猪鬃	100. 猪鬃

北平的学生公寓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我十三岁，正在天津读初中。东三省的沦陷，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情绪，也感染着我。

1934年10月，天津发生了“南开拉拉队事件”，当时我在现场，受到一次生动的爱国、抗日教育。事情的原委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邀请各国驻天津领事光临开幕式。为了给大会助威助兴，也为了借机向观众宣传抗日救国，南开中学组成一支四五百人的拉拉队参加大会，占据了主席台对面的看台。开幕式进行中，他们在外号“海怪”的南开大学学生严仁颖（南开创办者之一严修之孙）的指挥下，用各种颜色的小旗子组成“勿忘国耻”“恢复失地”“还我山河”等标语，反复展现，引来全场数万观众的鼓掌欢呼。在场的日本领事恼羞成怒，蛮横地提出抗议，要求解散拉拉队，处分领队人。当局软弱无能，居然屈从，把组字撤销了，只允许喊助兴的啦啦词，使本来群情激奋的开幕式声色大减，观众无不气愤。次日，大公报发表社评《华北运动会的眼泪》，对南开学生的爱国行动深表赞赏。

此后，我转到北平读书。当时的北平，虽有外敌入侵的威胁，毕竟尚未兵临城下，人们还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在北平读书的各地青年学生，许多人是住在公寓的，那其实就是变相的学生宿舍。北平的学生公寓起源于辛亥革命之后。1913年，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成为全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吸引了各地学生前来就读。但当时校内的学生宿舍不敷使用，一部分学生便在校外租住民房。精明的商人抓住了商机，开创了一种新的行业——经营房产，专门出租给学生居住，命之曰公寓，以区别于接待过往旅客的一般旅馆。此即为北平公寓的由来。北平的第一家公寓就出现在东城沙滩北京大学附近，以后发展到全城。1930年代，正是北平公寓的极盛时期，估计全市不下百家。

公寓差不多都是深宅大院，一律单间平房，按月计租，包括伙食费在内，一般家庭尚能够负担。有些学生在一家公寓连住三四年，直到毕业。那时，北平西城学校最多，所以公寓也多。北平最老的一家公寓叫“鸿雪缘公寓”，就开设在西单西京畿道。

在公寓比较集中的地方，又有很多“卫星店铺”围绕，专做学生的生意，如饭馆、杂货铺、洗衣坊、自行车修理铺等等。早晚还有走街串巷的小贩，前来兜揽生意。早晨，躺在床上就能听到胡同里传来买杏仁茶、豆浆、油条、脆圈、马蹄烧饼的吆喝声。入夜，又有夜宵送上门来。卖馄饨的、卖酱牛肉、猪头肉的、卖硬面饽饽的接踵而至，别是一番热闹。这些小商贩很会做生意，与学生们混熟了，都可赊欠，月底结账，彼此方便。

学生们在公寓里的生活丰富多彩。五湖四海的青年走到一起来了，“天涯若比邻”，无形中就缩短了地域之间的差距。读书之余，大家互相串门聊天，趣味盎然。东北学生与云南学生在一起，一个讲北国冰天雪地的景色，一个说昆明四季如春的风光，彼此神往；沿海省份与西北内陆的两地同学聊天，会惊诧于祖国的辽阔，地域的反差。每逢假期后开学，公寓里又是另一番情景。各地同学从家乡带来了各自的土特产、小食品，互相介绍、馈赠、品尝，颇似小型土特产交流会，那口福也是令人难忘的。这些，对我后来在抗战中走南闯北，颇有裨益。

1935年，大汉奸殷汝耕在日本人的扶持下组织了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我的家乡宁河也被划入其势力范围。继而，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图谋平津，一向安定的北平也不平静了，公寓里时有骚动，不断发现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传单或标语。驻北平的中央宪兵三团经常派人深夜闯入公寓，搜查学生，抓走他们认为可疑的人。公寓里抓人，公寓外就有人在墙上写“向蒋孝先讨回血债”的标语。（蒋孝先是蒋介石的侄子，宪兵三团团长，迫害学生的刽子手）

同年，“北平学生抗日联合会”成立，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12月9日、26日，更爆发了两次震动全国的北平学生抗日救亡游行示威运动。运动中，许多公寓成为秘密联络点，各学校的联络员到指定的公寓接头，互通消息。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学生抗日运动，另外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显然，他们是不要“抗日”二字的。社会上称前者为“旧学联”，

后者为“新学联”。这两个对立的学生组织斗争了一年多。

1936年12月13日，在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日子里，又传来了前一天西安事变的消息，轰动了社会各界。北平各学校、各公寓的两派学生更展开了斗争，一派支持张、杨逼蒋抗日，一派要打倒“劫持领袖”的“逆贼”，最后发展到上街游行示威。

“一二·九运动”和西安事变这两件事，震动全国，影响极大，我也积极参加了多次游行示威活动。那时，凡有爱国之心的人，无不反对内战，要求抗日。我更因为家乡沦入敌手，十分仇恨日寇。【注2】

1937年“七七事变”，8月，日本占领北平，学生公寓从此衰落，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北平再也没有恢复公寓这个行业。

【注2：已故著名画家高马得先生是我父亲的中学同学，他在悼念老友的祭文中回忆说：“‘一二·九’以后，高峰找到我说，在家乡看到日本人耀武扬威的样子，实在忍受不了。要我介绍他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说，干什么都可以，死也不怕！那时，学生运动已经进入低潮，形势很紧张，此时他来找我，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后来听说他做记者揭露河南大灾，我想，这就是那个不怕死的张高峰！当年他那急切参加抗日的神情，又重现在我眼前。他的血是热的，看到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流离失所，他怎能不热血沸腾，怎能不为民申冤，怎能不向社会控诉?!”——张刃】

抗日救国与新闻理想

高中时代，除了抗日，我考虑最多的还有个人出路和职业问题。我偏爱人文社会科学，却不想去做公务员，因为那不仅受制于人，而且“一朝天子一朝臣”，主子垮了，手下必然“树倒猢猻散”。我的理想是做一个独立、自由的新闻记者，拿起一支笔“指点江山”，可以随时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对社会事物，赞成的就歌颂，就支持；反对的就揭露，就挞伐；

自己不受别人的气，还可以为受欺负的人打抱不平，那是一个清高、超然的职业。而且，只要有社会就会有报纸，只要有报纸就需要记者，不怕失业。

我之所以做这样的选择，一方面与自幼失怙，家道中落，饱尝寄人篱下的困苦经历有关——因为穷困，交不起学费，我读初中、高中，曾经不得不在平津两地换过四个学校；另一方面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当时，《新生》杂志主编邹韬奋、大公报记者范长江等人写的文章风靡一时，很受青年学生欢迎；天津又是很有社会影响的大公报的发祥地，许多青年人都是它的忠实读者，都羡慕用笔和思想影响千万读者的报人，我也如此。

有了职业追求，我从中学时代起就为实现自己的理想做努力，一方面注意浏览各种报刊，课余多读政治、历史、文学书籍，丰富自己的知识，锻炼自己的文笔，并开始向报刊投稿。另一方面还曾和同学一起办过一份旬刊，向小学生宣传抗日。虽然后来因为赔本停刊，却也尝试了新闻工作实践。

1933年，日寇越过长城，进犯华北。时任热河省主席、奉系军阀汤玉麟不做抵抗，仓皇脱逃，拱手让出承德，放弃热河全境，一时舆论哗然，连张学良都不得不因此承担责任，被迫辞职下野，出国“考察”。汤玉麟残部溃退平津，散兵游勇横行街市，闹得人心惶惶。我激于义愤，写了一篇《可杀的汤玉麟》，指斥其抗日无能，害民有术，投寄并发表于天津中南报。这是我生平第一篇见诸报端的文章，而且是抨击时政，为百姓说话，我很高兴。其实，杀不杀汤玉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通过报纸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主张。那年我十五岁。

读书、实践开阔了我的眼界，活跃了我的思想，我逐渐形成了两个观念：一个是，中国社会是不平等的，有人丰衣足食，有人饥寒交迫；有人有钱有势，有人受辱受欺。另一个是，中国社会是动荡的，内有军阀连年混战，国人自相残杀；外有帝国主义入侵，掠夺我国资源的同时压迫中国人民。因此，我渴求个人的自由、平等和国家的独立、和平。具体而言，抗日救国和做新闻记者，就成为我中学时代比较成熟和牢固的思想，并在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上起了支配作用。

卢沟桥的枪声

1937年夏，我在北平高中毕业，等待考大学。为了糊口，经投稿相识的《亚洲民报》编辑介绍，到西城一家“大中华通讯社”当抄写员，负责刻写钢板蜡纸，印发新闻稿，供各报使用；有时也跟着记者跑跑新闻，每天工作两三个小时，每月可有七八元收入，以维持生活。

那时，华北局势日益紧张，日寇不断向平津增兵，并且经常以演习为名寻衅滋事，战争随时有爆发的可能。岌岌可危中，偌大的北平真的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了。

进入1937年6月，北平街头更明显看出局势的紧张。有关日军进攻北平的流言四起；西长安街冀察政务委员会门前，小汽车穿梭出入中南海；阜成门内武衣库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公馆和西四兵马司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公馆门前也是车水马龙，军政要员频繁往来；二十九军全副武装的士兵，每天傍晚从西直门外和永定门外结队开进城里，分散住在各城门楼上、学校、庙宇等处，戒备日军可能的突然袭击，第二天天明又开出城外。北平市民都感到这是不祥之兆，预感战争就要降临头上。也有市民给战士们送去慰问品，表示支持他们抗日。

果然，7月7日，平西爆发了日军挑起的卢沟桥事变，从此揭开了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序幕。8日，北平各报都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出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经过。为了了解日方态度，我特地跑到北平图书馆，查阅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主办的《庸报》。我清楚地记得，它在7月7日的一版上就报道了中日军队在卢沟桥发生冲突的消息，并且把责任推卸给中国方面。这个标题极不显著的报道，把《庸报》标榜的“中立”伪装彻底撕破了。

返回大中华通讯社后，我向社长杨某谈及此事。杨曾留学日本，竟说《庸报》消息灵通，言语间流露出一种羡慕的口吻。傍晚，该社记者杜